

內在導向、根本性問題與 長程歷史

——評孔飛力《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

● 趙 崢



孔飛力 (Philip A. Kuhn) 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1994年1月，哈佛大學教授孔飛力 (Philip A. Kuhn) 應邀在巴黎法蘭西學院開辦系列講座，探討近

代中國的政治變遷。在法蘭西學院教授魏丕信 (Pierre-Étienne Will) 的努力下，這份講稿以《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Les origines de l'État chinois moderne) 結集，在1999年首先被譯成法文出版^①。法文版誕生三年後，該書又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英文版^②，隨即引起了歐美學術界的反響。著名中國史學者柯嬌艷 (Pamela K. Crossley) 評論指出，這本書雖然並不是孔氏關於十九世紀中國的理論及實踐的簡單歸納，但仍然提供了理解1840年以來中國歷史的問題指向^③。

此書英文版出版前夕，正值美國亞洲學會年會在紐約召開。與會的弗吉尼亞大學教授陳兼在希爾頓飯店頂樓俱樂部與孔飛力喝咖啡時，第一次聽到作者對於這本書的介紹，遂產生將其譯成中文的衝動。陳兼利用業餘時間從事翻譯工作，在與同事陳之宏教授的合作下，歷時十年之久，《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的中文版終於在2013年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內在導向」視角出發，以政治參與、政治競爭和政治控制作為主軸，討論了中國「現代國家」形成及發展的根本性問題。

儘管孔飛力表示從來不持「中國中心觀」，但《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在引導美國中國學研究者轉向地方和下層研究上起到重要作用，他亦十分強調中國研究的「內在導向」。《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即是突出「內在導向」的集大成之作。

10月和2014年初以簡體版和繁體版(引用只註繁體版頁碼)的形式，由北京三聯書店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分別出版^④。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從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內在導向」視角出發，以政治參與、政治競爭和政治控制作為主軸，討論了中國「現代國家」形成及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儘管此書登陸中國距離孔飛力在巴黎初次發表這些看法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年之久，但中文版甫一面世即引起了中國學者的關注和討論。楊念群表示，《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赫然加入了暢銷行列有點不可思議」，但究其「暢銷」的原因，「表達的是否通俗倒在其次」，「關鍵在於他想回答的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關鍵問題，這些問題恰恰也是一般人所關切的」^⑤。這本薄薄的小冊子(正文僅100多頁)究竟是在何種理論背景下出現，提出和回應了哪些「關鍵問題」，為何會在具有時空之隔的當下中國獲得相當的反響和共鳴？我們需要進出文本內外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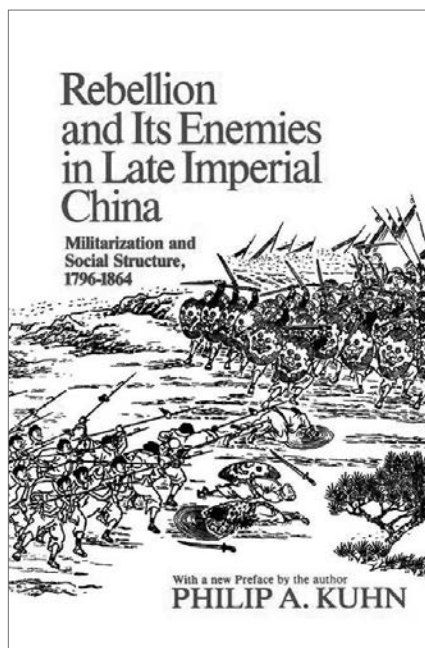
一 「中國中心」與「內在導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主導的美國中國學研究以「衝擊—回應」為理論框架，着重尋找外部因素(西方)對於近代中國轉型的影響^⑥。1970年代，柯文(Paul A. Cohen)以「直接應戰」的態度，提出全新的「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宣導從

中國內部而不是從西方角度着手研究中國史，關注區域與地方社會，推動下層社會歷史撰述，在方法論上力求史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⑦。「中國中心觀」的出現符合了當時美國學界研究非西方社會的總趨勢，即擺脫「殖民地史」的框架，按照這些社會自身的特點探索其歷史進展。在這樣的背景下，同樣以「中國中心觀」作為研究取向的孔飛力逐漸在美國中國學研究領域崛起。

1977年，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推薦孔飛力重返哈佛任教的信中，曾描述當時中國研究領域渴望求變的現狀：「正巧研究生們對當前許多關於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大規模全球性的一般性泛泛而談深為不滿，他們渴望區域的、地方的、鄉村的歷史。」^⑧孔氏正是在這一轉型時期聲名鵲起的學術界明星。在1994年前赴巴黎講學以前，孔氏已經憑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和《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奠定了自身的學術地位^⑨。儘管孔氏本人表示從來不持「中國中心觀」，其研究不只是以中國為中心^⑩，但《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在引導美國中國學研究者轉向地方和下層研究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孔氏亦十分強調中國研究的「內在導向」。《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即是突出「內在導向」的集大成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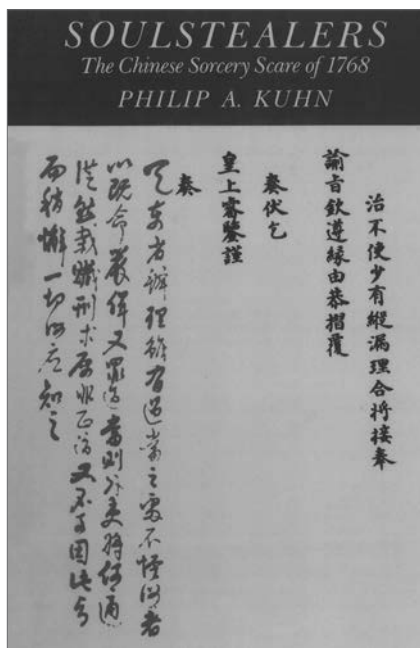
孔飛力在2009年為《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文版所作的〈中文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版序言》中指出，不同國家可經由不同方式走向「現代」。儘管面對人口、資源和技術等同樣的挑戰，「不同的國家由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背景所決定，所作出的反應是不同的」，「而它們的不同反應，往往是通過各自國家的不同特點而表現出來的」，「在一個『現代性』有着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種替代性選擇的世界上，政治歷史所要強調的，應當是同各種民族文化和歷史經驗相契合的種種『內部』敘事」（頁48）。早在1970年出版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一書中，孔氏就表示「中國政治制度的穩定性有其很深的社會制度的根源」，反對中國大陸史家將1840年鴉片戰爭作為「近代」起點的提法，「懷疑中國歷史的『近代』時期能夠用主要的外部事件來劃界」^①。

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中，孔飛力認為1890年代的危機不僅



Philip A. Kuhn,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導致了清王朝的衰落，而且導致了帝制時代晚期整個秩序的「災變」。在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之前，中國讀書人已經在思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頁57）。儘管他並不否認現代國家在中國的產生受到了外部世界種種力量的影響，但「從本質上看，中國現代國家的特性卻是由其內部的歷史演變所決定的」（頁55）。可以說，「中國中心觀」所宣導的「內在導向」，是包括孔氏在內的相當一部分美國中國學研究者長期以來觀察中國一以貫之的視角，一度成為取代「衝擊—回應」框架的新範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仍是這一研究取向影響之下的學術作品。

事實上，最近十多年以來，海外學界已對「中國中心觀」進行了一系列的反思^②，甚至柯文本人都承認這一範式存在局限^③。孔飛力自1990年代以來轉向對海外華人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在「中國中心觀」範式露出「失勢」迹象之時登陸中國，來得略晚一些，但「內在導向」的觀察視角仍有其合理成份；作者提出的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基本問題，依然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和強烈的現實性。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並不是一部描述中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具體過程的著作，而是聚焦於帝制晚期歷史與現代歷史之間的聯結點，即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

移民史的研究後，在某種程度上亦調整了原有的學術取向^⑭。與此同時，中國學者也表達了對於「中國中心觀」的批評和反省，指出這一旨趣本是針對西方的中國研究，並不特別適合中國大陸的「學情」^⑮。《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在「中國中心觀」範式露出「失勢」迹象之時登陸中國，令人感嘆其來得略晚一些。但在筆者看來，這部作品儘管有着非常明確的西方學術脈絡和時代語境，但仍有必要通過翻譯的形式引介給中國學界：一方面，「內在導向」的觀察視角仍有其合理成份，不宜一概否定；另一方面，作者在爬梳史料和分析提煉的基礎之上所提出的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基本問題，依然具有深刻的學術意義和強烈的現實性。

二 中國「現代國家」的「根本性議程」

孔飛力何以在書名中使用「現代」這個詞？何謂「現代」？對於這個並不容易界定清楚的概念，他迴避由自己進行定義，而是以一種看似「輕巧」的方式進行處理。他解釋說：一方面，「現代」是「簡單的，即「現時的存在」；另一方面，「現代」又「使人們聯想到一些更為深廣的問題」，「涉及同史學史演進以及人類規範發展有關的一系列問題」（頁47）。作者反對將經歷了工業化的西歐和北美所形成的國家功能、政治結構和社會體系作為判定「現代」的標準，認為這樣的看法「其實是一種文化上唯我獨尊的判斷」（頁47-48）。但從作者的論述

中仍能看出「現代國家」的一些基本特徵，即政治參與得以拓展，政治競爭和社會整體利益之間保持平衡，國家統一和地方自治並行不悖，達成權力制衡和利益妥協，實現憲政民主。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並不是一部描述中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具體過程的著作，而是聚焦於帝制晚期歷史與現代歷史之間的聯結點，即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在孔飛力看來，「根本性」問題是「當時人們關於為公共生活帶來合法性秩序的種種考慮」，「議程」則是「人們在行動中把握這些考慮的意願」。他認為，關涉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根本性議程」在十九世紀初期便已在中國內部出現，即「政治參與的擴大如何同國家權力及其合法性加強的目標協調起來？政治競爭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協調起來？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會的需要協調起來？」（頁56）

提出問題之後，孔飛力並沒有面面俱到地展開論述，而是以十九世紀魏源與馮桂芬的改革思想以及二十世紀湖南末陽的暴亂和中共推行的農業集體化作為幾個彼此獨立卻又有着內在關聯的故事，凸顯出不同於歐美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經驗」。作者引述魏源的思考說明，擴大政治參與的構想早在十九世紀中國就已出現，但拓展政治參與非但沒有意味着中央權力控制者將受到更多制約，反而會加強中央集權的合法性，「這就像我們提示了中國現代國家起源的獨特性和本土性」（頁106）。十九世紀中後期受

西方思想影響的馮桂芬提出按「得舉多少」分配政治權力的設想，也因中國社會「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之界限不分而胎死腹中，中國人選擇「加強官僚機構的控制，並以此來保證，更高層次的客觀性能夠超越狹隘的私人利益而出現」（頁134）。1940年代的末陽暴亂和19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則體現了國家同「包攬納稅的中介捐客」之間的長期鬥爭，國家與地方社會很難建立妥協機制（頁141-76）。

作者在對上述具體事例展開討論的過程中，非常注意將中國的現象與世界其他地區（主要是歐美）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類似問題進行比較。在談到魏源主張「文人中流」參政卻「沒有同時提出關於政治包容性的更具有一般性意義的理論」時，指出其看法「遠遠談不上是以人們的天賦權力為基礎的某種一般性理論」（頁102）。在論述馮桂芬思想所引起的爭議時，將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對於「公共利益」的看法與之進行對照，比較二者處理「公共利益和多數不同的私人利益」關係的不同（頁130-32）。在討論中國地方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中介捐客」問題時，將中國與英屬印度的稅收制度進行比較（頁149），並引述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革命前國家財政制度的研究（頁151-53），闡明新舊體制之間的相互關聯。

以今日學術觀點視之，孔飛力的這些論斷看上去並無特別出新之處。特別是論述「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關係的部分，儘管提供了

美國歷史語境下的類似案例進行對比，但對中國思想史上相關概念的整體把握仍滯後於同時代的日本學者^⑥。面對「現代性」問題的挑戰，他對西方主導的「現代性」經驗是否具有「普世性」表示深切的懷疑，不斷強調本土因素對於「現代」的制約、本土思想對於「現代」的過濾（〈譯者導言〉，頁40）；與此同時，他相信中國具有自我更新能力，對中國未來「現代性」建設（包括政治民主）抱有信心，但對於中國能否利用內部思想資源實現轉型，「是否能夠超越狹隘的基礎和僵化的中央集權而獲得實現」（頁197）又滿懷憂慮。在孔氏的論述框架中，「西方經驗」在無形中又充當了「普世價值」，仍規定了中國未來轉型的大方向（儘管必然會在中國語境中變異）；與此同時，十九世紀以來的「根本性議程」具有「消極連續性」，其長期影響又構成中國走向「現代」的障礙，這似乎籠罩着「中國停滯論」的色彩^⑦。

不可否認的是，儘管孔飛力的分析在今日看來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但《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的學術地位亦應得到正視。從中國政治的現狀來看，中國當下仍為確定政治參與的邊際、界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關係，以及協調中央與地方之間需求等十九世紀以來的「根本性議程」所帶來的矛盾困擾不已，其根源不能不追溯到孔氏所揭示的歷史線索，而這也是該書能夠引起中國讀者強烈共鳴的地方。譯者陳兼在另外一篇論文中呼應並補充孔氏的觀點稱，冷戰結束後的中國仍面臨「根本性

中國當下仍為確定政治參與的邊際、界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的關係，以及協調中央與地方之間需求等十九世紀以來的「根本性議程」所帶來的矛盾困擾不已，其根源不能不追溯到孔氏所揭示的歷史線索。

孔氏意在揭示，即便是「改天換地」的中國共產革命，也難以擺脫「根本性議程」的長期影響。越過「1949」這個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分界線，是孔氏對自身研究的超越和突破。

議程」的困擾，其崛起是一個充滿悖論並相當漫長的過程^⑧：

中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設想並實行這樣一種政治改革，它的目標既在於維持和增強國家的功能和能力，又在於建立起具有權力制衡的基本特徵的結構。中國人民還面臨着如何在不斷追求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過程中建設——或重新建設——社會道德基礎的艱巨任務，從而使得中國的持續崛起不僅能夠滿足人民物質層面的需求，也能滿足他們對於生活意義的追尋。

三 跨越「1949」：長程歷史視野下的憂思與希望

孔飛力以治清史見長，亦關注相關問題在民國的演變，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之前的著作中，並無直接涉及1949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討論（〈譯者導言〉，頁26）。但在此書中，他不僅將毛澤東時代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作為國家根除「中介掮客」的關鍵一環，納入現代中國應對「根本性問題」的長時段視野，甚至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三農」問題及相應的國家—社會關係變化有所提及。孔氏指出：「20世紀中國政治發展的故事似乎是雜亂無章的，也是具有多重發展方向的。但如果將20世紀當作整體來看待，這便成了一個關於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的故事。」（頁193-94）孔氏意在揭示，即便是「改天換地」的中國共產革命，也難以擺脫「根本性議程」的長期影響，

亦不得不從既往的應對策略中尋求解決方案。越過「1949」這個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分界線，是孔氏對自身研究的超越和突破，使得其對「根本性議程」的論證更具說服力和現實意義。

法國「年鑒學派」（the Annales school）史學家在「總體史」的研究中，特別重視用較長的時間尺度研究一個國家或民族的長期發展趨勢，此點對於美國中國學研究者探索中國內部的發展進程、突破「循環論」的框架起到了重要作用，推動了「中國中心觀」的形成和發展^⑨。孔飛力的學生時代和學術生涯伊始，正是年鑒學派在美國史學界的影響如日中天之時，孔氏亦深受其主要觀點的影響^⑩。《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正是孔氏以宏觀視野審視中國史的代表性之作。世易時移，「碎片化」的研究似已成為海內外史學的主流，像孔氏這般試圖「會通」的努力已不多見。

近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對於1949年以後歷史的學術研究漸漸興起，亦有學者注意到打通整體中國史研究的必要性。如馮筱才指出，就中國大陸當下研究現狀而言，能從某個角度切入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作整體考察的學術成果較少，「1949年」在研究者眼裏「便經常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邊界」，「但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從二十世紀歷史出發去進行比較，去了解傳統中國的一些本質特徵，可能會更能促使有理論深度的學術成果的產生。同時，今日中國的諸多變化，往往也可以從二十世紀整體史中找到關鍵線索」^⑪。從這個意義上說，《中

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可謂是提示了思考二十世紀整體中國史基本問題的一些路徑。

孔飛力能夠在現代中國史上發現「舊議程會在新的環境下一再表現出來」(頁169)，在長程歷史的視野下揭示中國歷史的深層次結構，在1990年代末固然是富有創見的學術解釋，但有些論斷也值得懷疑和檢視。所謂二十世紀中國史是「一個關於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的故事」這樣的結論，未免有根據今日之結果「倒放電影」之嫌。二十世紀以來，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非常複雜，孔氏這一論斷是否成立，仍需更多的史實支持和理論探討。事實上，這種以國家權力擴張和基層社會自治對立為基礎的「國家政權建設」框架，已經有學者進行了反思。張靜指出，「國家政權建設」並不僅僅意味着國家權力擴張，以及由此與地方自治形成的對立，「這種套路很可能阻止我們發現更多的東西」^②。讀者似可在孔氏研究的基礎上，思索現代中國是否具有另外關鍵的「根本性議程」。

孔飛力之研究同其他海外中國學研究一樣，其問題意識和研究思路常跟其本國和當時的學術脈絡、政治背景和觀察立場密切相關，對中國而言則屬「外國學」。孔氏之所以被視為治中國近代史的「大家」，在於其與許多海外中國學研究者相比，有着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和對中國文化更為深切的體悟，使得其對中國現狀和未來的認識都更為務實和理性。孔氏認為，對於從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根本性議程」，

「在帝制晚期，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已經夠困難的了」，「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並如此富有多樣性的國家，在人類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頁195)。對於中國複雜性的認識使得他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走向持有一種異常謹慎的態度。

1990年，孔飛力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學術會議上提交報告，不無憂慮地表示：「近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演變為甚麼那麼讓當代的中國人失望？好些看來頗有希望的發展，為甚麼老是以壓制、腐化告終？」他認為「替中國近代政治軍事政權服務的正是那些保守專制的西方思想」，中國在西方影響下的二十世紀政治制度，混淆了政治參與和政治控制的界限，「這種模糊不清在每一個工業化國家，包括自由民主制國家在內，仍然相當程度的存在着」，「一個由進行革命開端的政黨組織其後要轉化成治理國家的政黨有多麼困難」，「一個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公民是否能培養起一種信心，對政治問題公開而自由的發表見解，還是一個疑問」^③。他看到「中國有很多思想資源，既有專制，也有非常崇尚自由的傳統」，同時也認為「一黨不一定不能進行改革」，中國的改革可以並且已經在共產黨內部進行^④。

孔飛力素以文筆優美曉暢著稱於美國學界，經過譯者精細打磨的中文譯本也體現出很高的水平。為方便中國讀者更好地了解本書的寫作背景、翻譯緣起、敘述特點以及問題意識，譯者還撰寫了長達兩萬多字的〈譯者導言〉，對其學術價值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探討(頁3-45)^⑤。

所謂二十世紀中國史是「一個關於中央集權的國家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的故事」，未免有根據今日之結果「倒放電影」之嫌。二十世紀以來，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非常複雜，孔氏這一論斷仍需更多的史實支持和理論探討。

對於中國複雜性的認識使得孔飛力對於這個國家的未來走向持有一種異常謹慎的態度。這份外國學者二十年前的課堂講稿，仍然啟發着中國人對於過去和現在的思考。

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本書的中譯本在京、港兩地呈現出一些不同的面貌。北京三聯簡體版中，對於個別段落和文字做了少量的刪節和技術處理。例如，在評論大躍進時期國家對於糧食的過度汲取時，香港中大繁體版為「一旦這個體系處於運作狀態時，它所具有的汲取性力量，不管是為烏托邦式的空想家還是為可怕的殺人犯所利用，都是冷酷無情的」（頁166），簡體版則刪去「冷酷」二字。又如，繁體版譯者指出，「超級強勢的現代國家」在將任何「異議」從政治、社會和知識空間全然排除乃至鏟除後，也在現代環境和語境下始終面臨自身合法性敘述的挑戰的語句（〈譯者導言〉，頁32），在簡體版中也不見蹤影。繁體版以文革時期北京地下畫家團體「無名畫會」成員張偉創作於1976年的作品《太和殿》作為封面背景，將出版者的深意寄予其中。

這份外國學者二十年前的課堂講稿，仍然啟發着中國人對於過去和現在的思考。對於中國的未來，孔飛力「在總體上是抱有希望的——其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條件則是從『廣開言路』開始做起」（〈譯者導言〉，頁44）。如此而言，《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與中國讀者的見面尚不算晚。

註釋

① Philip A. Kuhn, *Les origines de l'État chinois moderne*, traduit par Pierre-Étienne Will (Paris: Armand Colin, 1999).

② 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③ 柯氏書評參見“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by Philip A. Kuhn, Review by 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5, no. 2 (2006): 408-10。其餘相關書評參見“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by Philip A. Kuhn, Review by David E. Kelley”,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4, no. 3 (2004): 498-500;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Review by Andrew Scobell”,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9, issue 1 (2004): 85-86。

④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1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

⑤ 楊念群：〈「硬」學術與「軟」文化〉，《經濟觀察報》，2014年1月27日。

⑥⑦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3；201。

⑧⑩⑫⑭ 參見龔詠梅：《孔飛力中國學研究》(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頁9；183；13；257。

⑨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⑩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楊品泉、謝思煒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5。

⑫ 對「中國中心觀」最主要的置疑是批評其理論框架過份着重

內部研究，而忽略了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如柯偉林認為，「中國中心觀」對於解釋民國時期的歷史未必合適，因為這一時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國際層面的影響，民國史是由中國的對外關係的性質所界定和塑造，並且最終必須依此來解釋的。參見柯偉林(William C. Kirby)著，魏力譯：〈中國的國際化：民國時代的對外關係〉，《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12月號，頁33-46。此外，王國斌、彭慕蘭和濱下武志等人的研究均從不同角度對「中國中心觀」提出了挑戰，參見王國斌著，李伯重、連玲譯：《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著，史建雲譯：《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濱下武志著，朱蔭貴、歐陽菲譯：《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⑬ 柯文對於「中國中心觀」的反思，參見周武、李德英、戴東陽：〈中國中心觀的由來及其發展——柯文教授訪談錄〉，《史林》，2002年第4期，頁38-40。

⑭ 孔飛力在華人移民史的研究中，以多元中心為基礎的研究視角，將華人及中國放置在一個更大的歷史語境和關係網絡中進行考察，體現了對於「中國中心觀」的超越。參見Philip A. Kuhn, *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7)。

⑮ 羅志田：〈發現在中國的歷史——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點反思〉，《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頁107-12。

⑯ 例如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對於中國「前近代」思想與近代轉型過

程中「公」、「私」概念的辨析和梳理，就遠比孔飛力更為準確和細緻。參見溝口雄三著，鄭靜譯：《中國的公與私·公私》(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5-88。

⑰ 對於美國「中國中心觀」認為十九、二十世紀中國存在「消極連續性」傾向的批評，參見夏明方：〈一部沒有「近代」的中國近代史——從「柯文三論」看「中國中心觀」的內在邏輯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9-13。

⑱ 陳兼：〈全球冷戰與中國「漫長的崛起」〉，載李丹慧主編：《冷戰國際史研究》，第十五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頁41。

⑲ 「年鑒學派」對美國中國學研究中「中國中心觀」取向的影響，參見張鎧：〈國際學術思潮與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載朱政惠編：《中國學者論美國中國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頁78-80。

⑳ 馮筱才：〈跨過1949：二十世紀中國整體研究芻議〉，《社會科學》(上海)，2012年第5期，頁152。

㉑ 對「國家政權建設」分析框架的反思，參見張靜：〈國家政權建設與鄉村自治單位——問題與回顧〉，《開放時代》，2001年第9期，頁5-13。

㉒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羅麗達原譯，林滿紅修訂：〈西方對近代中國政治參與及政治體制的影響〉，《新史學》，1991年第2卷第3期，頁117、126、127。

㉓ 〈譯者導言〉另刊於《開放時代》。參見陳兼、陳之宏：〈孔飛力與《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開放時代》，2012年第7期，頁140-58。